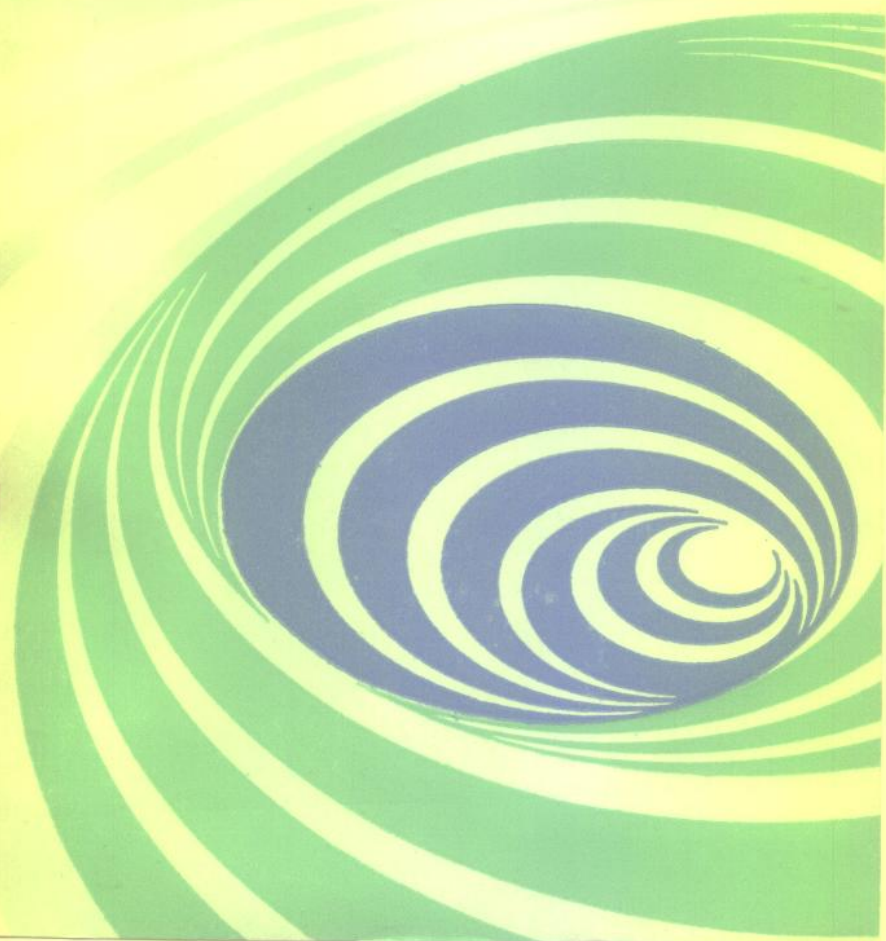


人民的灾难

杨培新 著



通货膨胀——人民的灾难

对中国当前要不要实行通货膨胀的论战

杨培新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晓岚

封面设计 杨华如

通货膨胀——人民的灾难

杨培新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开 6.75印张 163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017—0911—4/F·592

定价: 3.20元

目 录

我对通货膨胀问题的探索（序言）

- | | |
|---------------------------------|-----|
|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物价上涨····· | 16 |
| 当前的物价形势和价格改革····· | 32 |
| 当前是制止通货膨胀的黄金时刻····· | 36 |
| 制止通货膨胀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 51 |
| 制止通货膨胀有赖于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 59 |
| 治标治本兼施，一举制止通货膨胀····· | 65 |
| 中国通货膨胀的起因和对策····· | 72 |
| 制止通货膨胀，必须加速金融体制改革····· | 80 |
| 通货膨胀必然带来金融危机····· | 90 |
| 现金管理制度能不能管住资金体外循环····· | 103 |
| 治理整顿带来的变化····· | 113 |
| 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对策····· | 124 |
|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第二阶段应以搞活市场、搞活投资为重点····· | 139 |

以改革统率调整，才能有效制止通货膨胀

——十年改革反思 155

附 录

怎样观测当前的货币流通状况..... 180

防止因信用膨胀引发通货膨胀..... 192

对美国通货膨胀的考察..... 199

我对通货膨胀问题的探索

序言

我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调查研究，从1943年算起，已历时47年。我的结论是：只要发生了通货膨胀，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职工、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机关干部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对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我们要彻底地加以揭露，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结束通货膨胀。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既要警惕通货膨胀思潮的侵袭，揭露其危害，又要及时制止通货膨胀现象的出现。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最容易发生通货膨胀，而且演变成为长期的、隐蔽的通货膨胀。宣传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通货膨胀，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当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时，如果贸然实施价格改革，那就会使隐蔽的通货膨胀转化成为公开的、剧烈的通货膨胀，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并污损了改革的形象。社会主义必须过好通货膨胀关。

我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始于1940年。当时我在南方局青委《战时青年》社工作。周恩来同志通知我们，马寅初教授是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给蒋介石、孔祥熙讲过经济知识。他在重庆大学演讲，指出抗战前几年靠通货膨胀、掠夺穷人的钱财打仗，今后应当开征战时财产税，让豪门巨富出钱打仗。马寅初把这写成文章在《时事类编》上发表，但特务把这期刊物全部收买以后销毁。我们共产党人要翻印这篇文章在学生中广为散发，支持马寅

初为民请命的主张。

周恩来同志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正在分化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正在掠夺、吞并民族资产阶级。党要动员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四大家族。为此，1943年党派遣我进入重庆《商务日报》。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已经由和缓阶段进入恶性阶段，物价上涨的倍数远远超过法币增发的倍数。国民党政府发票子，90%用以支持战争，10%用于发展官僚资本主义。乘物价狂涨之机，实行统制经济，管制物价，实施花纱布、猪鬃、桐油、生丝的统购统销和外汇管制，以掠夺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四大家族就依靠发国难财，成了暴发户，积累了几百亿元的财富。通货膨胀、统制经济、官僚资本三位一体，就是国民党政府不可动摇的财政经济政策。当时我们以新闻和专栏文章，对国民党政府展开揭露和分析，受到了各阶层人民以至家庭主妇的关切。1945年抗战胜利后，法币流向沦陷区，流通区域有所扩大，物价有所回落，我写了《通货膨胀的警钟响了》，提醒人们不要麻痹大意，国民党正在大发钞票，为扩大内战筹措经费。1947年国民党政府采用经济紧急措施，以行政管制来延缓物价上涨。我写了《中国通货膨胀论》一书，根据事实和数据，预测法币即将崩溃。这本书由生活书店出版，并由最早反对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的马寅初先生作序。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法币崩溃之后，又发行金元券，号称拥有充足的黄金、外汇储备。我在香港《文汇报》，运用驻上海、南京记者从中央银行内部得到的材料，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唱空城计，并没有金银外汇储备，金元券在几个月内即将宣告崩溃。1962年，我利用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档案材料，写成《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为法币、金元券、银元券盖棺论定。此书1982年又加以增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9年我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同志约我见面。

他说：我读过你写的《中国通货膨胀论》《新货币学》。你是研究通货膨胀的，应该到银行来参加制止通货膨胀的实际工作。南汉宸同志是卓越的政治家、银行家，为时所衷心敬仰。我进人民银行帮助他研究金融政策。33年的银行工作实践，帮助我比较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银行怎样对国民经济发挥其调节作用。南汉宸同志很深入细致，作出决策时又具有战略眼光。他热爱青年，热爱人民，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在他领导下，我参加了1950年3月统一财经工作、制止通货膨胀的斗争。接着，我又经历了60年代制止通货膨胀、调整国民经济的斗争。1981年又参加了进一步调整和制止通货膨胀的战役。我经历过1949年以及1961年通货膨胀的艰难岁月，深知通货膨胀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因此我衷心地支持和拥护周恩来、陈云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制止通货膨胀的坚定立场。1955年换发新的人民币时，我写文章宣传中国模式的货币改革。这个改革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在1948年发行人民币来取代金元券，然后在1950年3月稳定人民币的币值，最后，在1955年以1：1万的比率收回旧币，扫除通货膨胀的残迹。兑换新币时，我们也不采取苏联的差别兑换方式，而在风平浪静中完成了货币改革，实现了由通货膨胀向通货稳定的转换。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货币制度具有独立、统一、稳定的特点。独立是不象法币那样依附于英镑集团、美元集团。统一是全国使用一种货币，形成统一的市场。稳定是它坚决排除通货膨胀，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这些文章收入《发行新人民币的意义和作用》）1957年反冒进中，我研究和阐述了必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才能保证货币稳定的观点。我认识到我们不仅要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而且要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开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创了历史的新篇章。改革和通货膨胀之间

存在什么关系，是新的研究课题。“四人帮”统治年代，中国发生了长期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这表现在消费品供不应求，凭证凭票供应的商品近100种，占主要消费品的60%左右。“洋冒进”从国外引进大量成套设备，又增加外汇支出，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八亿农民不甘心忍饥受饿，进行了包产到户的改革，国家又适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50%。农民积极性提高了，又多卖一些农产品，农村收购中投放的货币陡然增加一倍。我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没有提高城市粮油产品销售价格，这是因为考虑到职工负担能力有限。这就使财政赤字1979年扩大到170亿元，银行为此1980年增发了79亿元票子。1980年调整副食品价格，物价上涨6%。国务院决定1981年进一步调整，以制止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1981年削减基本建设投资200亿元，用以弥补农产品购销价格倒挂的亏损。现在看来，这步棋走对了，既提高农产品价格，配合包产到户，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副食、棉花、油料、烟叶等大量增产，为轻纺工业提供原材料，为出口贸易提供了出口物资，又由国家承担提价亏损，不提高物价，不降低城市职工和知识分子、干部的生活水平。这就使改革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改革过程中怎样掌握货币政策，又是新的课题。那几年随着农产品收购数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加货币发行。有的同志认为当年平均货币流通量和当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保持1:8的比例，是从历年数据中概括出来的，如果降低到1:6就到达危险点。而1980年已达1:5.98，建议立即煞住货币投放。但是，北京经济学院邓家荣副教授组织学生到安徽凤阳、山东平原调查，发现1978年原生产队平均保存货币120元，农民则终年不见钱。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平均每家手持货币123.6元。因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已由生产队转移到农民家庭，而农业经营规模又有所扩大。农民手持货币增加，城市个体户、私人企业持币增加，使货币流通速度

减慢，吸纳了多投放的货币。据此，我们认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改变了货币流通渠道，过去1：8的公式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建议对农产品收购的货币投放，采取放手供应，充分满足的方针。农民手头有钱以后，要买工业品，但国家多收购的棉花、糖料、烟叶，一时加工不出来，消费品供不应求。我们大力发展储蓄把这笔钱吸收进来，用以对轻纺工业办理中短期设备贷款，用于增加关键设备并进行技术改造。由于1979年到1982年农业生产连年递增7.5%，轻工业生产也就达到连年递增11.8%的水平，带动整个工业生产连年递增7.2%。工农业生产发展了，1982年财政赤字减为29.3亿元，新增货币减为42亿元，外汇储备增为111.25亿美元，物价当年仅涨1.9%，并出现了消费品的买方市场。本书附录中收进的《怎样观测当前的货币流通状况》《防止因信用膨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对美国通货膨胀的考察》就是调整时期对怎样掌握货币流通规律的探索记录。

1983年进入了建设时期，货币流通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货币流通有季节性变化，一般是下半年农产品收购季节投放货币，次年上半年回笼货币。1980年上半年回笼24.4亿元，1981年回笼39.7亿元，1982年回笼43.8亿元，但1983年只回笼17.1亿元。其主要原因是1983年建设开始，基本建设投资迅速增加，而基建投资中由于支付建筑工人工资，购买砖、瓦、灰、砂、石，以及购买地皮、支付拆迁费用，其中40%左右要转化为现金投放，因而增加了上半年现金投放。这样情况下，建设投资成为影响市场货币流通变化的重要因素。建设时期是最容易发生通货膨胀的，我们建议国务院及时设立中央银行，对货币流通进行调节。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十二大确定了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由于各地各部门总想发展得快些，提出了提前翻两番的口号。河南巩县提出提前10年翻两番。发展速度过热，宏观控制机制不健全，带来了

1984年信贷失控、货币失控、外汇使用失控、投资失控、消费失控，集中表现在1984年投放货币高达262亿元。这震惊全国，带来了1985年的抽紧银根。由于抽紧银根中“一刀切”，对一些适销对路商品、出口商品生产和收购也抽紧了银根，导致1986年2月的工业生产滑坡。

这次滑坡迫使我们中止抽紧银根政策，重新恢复了资金供给体制，继续追求高速增长。从1983年开始的新一轮通货膨胀，在1985年抽紧银根失败以后，开始进入高峰。这时举国朝野都注意到通货膨胀的问题，从1987年就开始了有关要不要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争论。这场争论就其针锋相对，发表文章之多，可以说是一场大论战，时间一直延续到1990年。但争论的主题却有过度变迁。一般论战，是在报章杂志上公开进行，而这次论战主要在内部进行，发言时点到即止，在报刊上则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不指名道姓，明显交锋。我长期研究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国务院领导同志又曾问到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为了人民的利益，总得讲出自己的意见。这本小册子，收进的就是这期间参加讨论的一些主要文章。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物价上涨》写于1987年10月，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已经比较明显，物价上涨8.8%。当时，还有一些同志认为，货币是少了，而不是多了。投资并没有膨胀，因为机械工业至少有10%的设备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电力设备发电时数也一度出现降低的趋势。因此，为了追求国家的“腾飞”，必须增发货币，增加投资。为什么说货币少了呢？因为当时计算货币必要量时有一个“三因素”说。即，一要计算国民经济增长率，二要计算预计当年物价上涨所需要相应增发的货币，三要计算货币流通速度延缓的因素。实际工作中，则是倒过来算的。计划部门定了国民经济增长率，定了基本建设投资，定了流动资金增加额。银行既计算贷款增加额，又预计了储蓄和存款增加额，

中间出现了巨大的缺口，这叫信贷差额（台湾叫金融赤字），即放款大于存款的差额。这个差额就需要用增发纸币来加以填补。如果单纯根据经济增长率，那就根本不应增发那么多的票子。这就需要再加上当年预定物价上涨的百分比。再不够，剩下来的差额就用货币流通速度减缓因素来加以说明。货币流通速度难于测算、无从统计，对此，他人很难提出异议。“三因素”说，就成为通货膨胀合法化、合理化的根据。然后据此证明，当时并不存在通货膨胀现象。

以《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物价上涨》为题发表意见，是考虑到物价上涨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就从这里点出根子在于票子发得过多。而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因素，因包产到户已于1983年完成，个体户发展已达高峰，鉴于流通速度加速和减缓的因素同时存在，相互冲销，建议今后不再计入这个因素。同时认为，当年物价上涨是上年票子多发的后果，一般从票子多到物价上涨要有一年左右的滞后期。因此，如果按当年物价上涨率再多发货币，必将预告下年度物价进一步上涨。如果不想使物价连年上涨，就不应再按当年物价上涨速度增发货币。这篇文章通过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不赞成通货膨胀的观点。同时表述了财政金融必须双紧的意见。

1988年4月出现第一个抢购高潮，通货膨胀现象已充分暴露。当时有些同志却认为“双紧”必然带来工业生产滑坡，这有1986年2月因抽紧银根而导致工业生产滑坡为证。对1987年冬决定的财政、金融双紧政策，发生怀疑。当时还有一些同志认为，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加速国民经济增长，只要不是恶性通货膨胀。有些同志到国外考察，发现拉丁美洲物价年涨近百倍，人民仍安居乐业，没有出现社会动乱，又提出外国人承受通货膨胀能力高，还是中国人承受能力高。有人再进一步论断，中国人60年代通货膨胀中挨饿也不造反，由此可见，中国人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高

于其它国家。这种情况下，形势急转直下，通货膨胀日益凄厉。另一方面，出现了价格改革必须先行，价格改革晚改不如早改，长痛不如短痛的主张。在准备闯关的思想影响下，大城市工业品因原料涨价而纷纷调价，带动了全国物价上涨的形势。但是有些同志说，这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价格结构性调整，主要是由于农业发展滞后带来农产品、副食品的涨价。1988年6月我写的《**当前物价形势与价格改革**》根据各类物价普遍上涨论证这并非价格结构性调整，而是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是趁热打铁，加速价格改革，还是釜底抽薪、制止通货膨胀？根据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美元，工资主要用于吃、穿，通货膨胀会使人民从温饱线下降，我认为中国人民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必然低于发达国家和半发达国家。对“长痛不如短痛”也作了可行性研究。认为要作到这点，必须对职工按物价指数发给工资，那你怎么涨价也不会有人反对。对储蓄必须保值，对4000亿元储蓄每年多付520亿元利息，这就是对“短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建议价格改革必须先制止通货膨胀，同时狠抓企业改革。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委婉地劝说不要搞价格改革闯关，不要搞“长痛不如短痛”。

1988年8月物价上涨引起抢购风潮，我写了《**当前是制止通货膨胀的黄金时刻**》。当时有些同志宣传通货膨胀有利于加速农业生产发展。有些领导同志还问为什么国家拿不到物价上涨的收入。一些同志则认为东欧国家没有尽先进行价格改革，丧失了良好时机。我写的这篇文章以当时已经出现的事实证明通货膨胀已经打击了工业和农业生产，根据调查材料说明职工、农民、知识分子、干部普遍受到通货膨胀之害，而且说明通货膨胀利益归于官倒爷、私倒爷，国家拿不到涨价收入。1988年春，学术界有些同志建议多发票子获得一批资金，票子买不到东西存进银行，强迫储蓄，又可获得一批资金，用这种办法筹集资金，可以加速

建设。对此，我引用通货膨胀破坏储蓄、引起储蓄滑坡，来证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时指出东欧早已进行价格改革，但由于实施通货膨胀，并没有达到理顺价格的目的。最后，认为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当前是制止通货膨胀的黄金时剂。

《制止通货膨胀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写于1988年9月，在政治局公布价格工资改革方案、社会出现抢购风潮之后，三中全会之前。认为1989年猛调物价的方案不适当当前情况，会为物价上涨火上加油。建议1988年冬、1989年全年应立即制止通货膨胀，采取紧急的有力的措施，包括压缩基本建设，吸收社会游资，稳定货币，价格改革限制在每年物价上涨3—6%的前提下进行。这是向党中央、国务院坦率陈辞和紧急呼吁。

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决定之后，1988年10月写的《制止通货膨胀有赖于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提出要进一步实行政治体制配套改革，推进决策民主化，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具体审查投资项目和经费开支。建议中央银行应由人民代表大会管辖，因为作为政府成员必然把支持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而受人民代表大会管辖，向人大作报告，就必然促使中央银行优先考虑稳定物价、保障人民生活安定。美国、联邦德国、南斯拉夫中央银行归议会管辖，有深远的意义。又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发生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现象，是由于大锅饭、铁饭碗、瞎指挥的体制，压制了生产力。政企不分，政府直接向企业下达计划和指令，直接掌握建设项目，而又不负经济责任，使企业经济效益下降，投资效益低下，造成生产和建设的浪费。因此，要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并防止今后一再出现通货膨胀，有赖于深化改革，彻底摧毁通货膨胀从而滋生的病灶。

《治标治本兼施，一举制止通货膨胀》写于1988年11月，借用弗里德曼来华讲演中提到的“制止通货膨胀，就象割狗尾巴，不能一刀一刀地割，而是要把它一刀砍下来”，认为当前经济条

件有如1950年,时机已经成熟,应当把通货膨胀“一刀砍下来”。建议猛砍基建,扩大保值储蓄,冻结物价。

《中国通货膨胀的起因和对策》,是针对有些同志认为改革带来通货膨胀的观点写的,认为通货膨胀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旧体制所带来的投资膨胀及社会集团消费膨胀,而建设急于求成,价格改革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是通货膨胀一再爆发的根本原因。

财政赤字和银行信用膨胀,是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渠道。我写了《制止通货膨胀必须加速金融体制改革》,向金融界发出呼吁。通货膨胀及其后的紧缩银根,使金融业受到剧烈的震荡,从而发生金融危机,这表现在储蓄滑坡、企业“三角债”、“债务链”支付危机、农村打白条子、现金脱离银行在体外循环。这个问题,不仅受到金融界的注意,也引起企业界的关切。《通货膨胀必然带来金融危机》主要说明这是通货膨胀中的派生现象,必须完全消除通货膨胀威胁之后,金融事业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现金管理能不能管住资金体外循环》,是说明现金管理是依靠行政命令行事的,在建立社会主义金融体制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在商品经济体制下应主要依靠银行改进工作、加强服务,才能发挥银行的社会总簿记、总出纳的作用。

治理整顿一年多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后工作重点是什么?1989年9月我作了初步分析,提出一些观点。1989年12月,经济情况逐渐明朗,我试作进一步的分析,写成《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对策》。我认为治理整顿已初见成效,已经刹住了货币增发、物价不断上涨的势头。根据我国1950年制止通货膨胀的经验,抽紧银根的任务完成以后,应转入第二阶段,工作重点是巩固物价稳定、搞活市场、搞活经济,同时抓紧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认为搞活企业的启动点,应放在商业收购和销售上,建议国营商业重新发挥主渠道、蓄水池、调节社会生产的作用。

由于市场疲软、工业生产滑坡,如何脱出困境,走出低谷,

成为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和我们原来的论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有些矛盾。我认为1983年到1988年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国民收入超分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是不容否认的，其根源在于建设急于求成，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急于“腾飞”，而政企不分，政府直接掌握扩大再生产投资，又带来投资效益低下，引发投资膨胀，这是通货膨胀的根源。但是经过一年多治理整顿，运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各种手段，总需求已经得到压制。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根据原来的判断，否定即期需求或现实需求不足。既要有看到长远趋势的战略眼光，又需要对每个战役的细致变化进行考察。既要肯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长期趋势，并指出造成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客观条件——如建设急于求成；政府直接管理投资项目、投资效益低下；政权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没有提出精兵简政要求，导致财政赤字持续了十多年；银行宏观控制的机制薄弱、操作不够灵活，等等，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水瓢是压下去了，但随时还可能冒上来，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我们又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承认当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要把搞活市场，搞活企业，搞活投资放在重要地位。怎么搞活投资？是不是又责成计委增开建设项目，财政增加拨款，建设银行增加基建贷款？不是的，这是重新走上老路，不要多久就会重蹈扩大财政赤字、扩大信贷差额、增加货币发行的覆辙，重新出现通货膨胀。搞活投资，就是要进行投资体制改革，搞活企业投资。取消企业技术改造要纳入笼子的限制，只要企业有钱，企业自负经济责任，又符合产业政策，就要支持企业上一些项目。这种投资不会滋生投资膨胀、不会滋生重复建设和浪费，不会扩大财政赤字、银行信贷膨胀。这里讲的技术改造，包括企业的改建、扩建、异地扩建。例如首钢和山东合作在山东济宁创办齐鲁钢铁公司，建设年产1000万吨钢材的钢铁基地。就是因为首钢地处首都，发展受到限

制，不能不搞异地扩建。铁道包干以后，拟和地方合作兴建京九铁路，把广梅汕铁路、吉安向塘铁路、阜阳到商丘分段建筑的铁路，贯通起来，形成从北京到九龙的南北大干线，资金由铁路、地方、群众自筹。这样一些项目就应当尽快批准，以振奋人心，给人们以国家欣欣向荣的印象。技术论证、经济论证应该做，但首先要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论证。改革生产关系、改革经济体制，才能解放生产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一文，还分析了原有货币流通量已压缩将近1/3，抽紧银根已经到位，应保持一定货币流通量，才能保证货畅其流。通过储蓄货币回笼过多时，应即通过商品收购投放出去；当货币流通量过多时，应即收缩贷款、多吸收储蓄。这点是1950年5月调整工商业、搞活市场过程中领会到的。这使我知道，通货并不是回笼得越多越好。回笼过多、货币过少时，就如一个人失血过多，会引起生命危险。过犹不及，一样误事。国民经济如果不能正常运转，就会影响10亿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到几十万人停工待业。货币是多了、少了，这是可以科学地计算出来的，不能凭臆测办事。因此，我认为应坚持实事求是，多了就是多了，少了就是少了，直言不讳。如实反映情况，不浮夸，不讳疾忌医，这是作好经济工作的前提条件。只有情况明，才能对策准，决心大。

《以改革统帅调整，才能有效制止通货膨胀》，是我联系通货膨胀问题对10年改革的反思。我认为10年改革是成功的，尤其是包产到户、企业承包、对外开放。有些同志否定“五包”——包产到户、企业承包、地方财政包干、地方外贸外汇包干、行业包干，甚至把并未实施的银行承包，也列入在内，干脆提出要“五不包”。我认为没有包产到户，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企业承包，我们就没有衣穿。这两条是改革的主要成绩，取消这两条就等于否定了改革。至于地方财政包干，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